

万斯同与《明史》

纪念万斯同诞辰3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



万斯同与《明史》

纪念万斯同诞辰 3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

目 录

天一阁藏《明史稿》述要	万 明 解 扬(1)
天一阁藏万斯同《明史稿》考辨	黄爱平(28)
天一阁藏《明史稿》第六册《郝杰传》在几种版本中传文的变化	廉 敏(56)
天一阁藏明史稿《赵佑传》的整理及相关问题	张兆裕(67)
天一阁藏稿本《明史稿》之《忠义传》两题	张金奎(86)
《天一阁藏明史稿·罗汝芳传》初探	陈时龙(99)
天一阁藏万斯同《明史稿》考论	谷 敏(123)
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列传稿的整理 ——兼论其在明史纂修中的意义	方祖猷(140)
复旦大学藏万斯同《明史列传稿》述略	李春博(158)
万斯同诗文集考略	朱端强(171)
试论万斯同的史学成就	邓 瑞(185)
万斯同在《明史》修纂中的贡献	王兴亚(193)
万斯同的史学见解在《明史》编纂中的作用及其对清初史学思想的影响	王记录(212)
万斯同参与《明史》纂修之目的及缘由	王雪华(230)

目

录





试析《四库全书》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对万斯同的评价	沈一民(243)
万斯同文学思想浅探	周慧惠(252)
万斯同编辑思想论述	赵连稳(265)
万斯同金石文字学的研究及其学术思想	周永良(275)
万斯同的政治思想探微	乐承耀(284)
论万斯同读书著述生涯	张 波(306)
朱鄮卿与天一阁藏《明史稿》	袁 慧(314)
冯贞群收集、整理及保护万斯同遗文遗迹事略考	饶国庆(324)
清初甬上的“诗史”思潮与万斯同的“诗史”创作	管凌燕 张如安(338)
万斯同《明史稿·孙鑛传》订正	王孙荣(353)
豪气长留笔触间 ——读万斯同《书学汇编》	杨成鉴(357)
关于万斯同《儒林宗派》的几个问题	杨艳秋(362)
黄宗羲藏书与万斯同修史	诸焕灿(377)
万斯同与温睿临	陈其泰 屈 宁(391)
万斯同与李堪	朱义禄(407)
万表事功简论	胡 凡(415)
万言生平述略	夏 柯(423)
万斯大《学礼质疑》的学术特色	申屠炉明(431)
关于《明史》修纂的几个问题	段润秀 白 云(457)
清朝纂修《明史》论述	乔治忠(473)
二十世纪以来万斯同研究的学术史考察	钱茂伟(495)
旧传万斯同 416 卷本《明史》〈列女传〉研析(摘要)	衣若兰(134)
万斯同《庙制图考》小识(摘要)	林存阳(135)
万斯同与浙东史学(摘要)	叶 建(138)
浙东学人与《明史》编纂	虞浩旭(445)
万斯同《明史稿》研究述论	李开升(517)

天一阁藏《明史稿》述要

万明解扬*

宁波天一阁庋藏的明史稿(以下简称“阁藏《史稿》”),共十二册,兼含稿本与钞本,有墨、朱笔删改及名家之铃章、题跋。该稿早年曾引得著名学者登阁观览,留下了多种推论与识断意见,但始终以善本深藏,未广为人知,更未能为学人所研用。时值万斯同诞生 370 周年,天一阁博物馆将其影印出版,化身千万,嘉惠于学林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天一阁合作,正式立项《天一阁藏《明史稿》整理与研究》课题,由历史所明史研究室具体承担。我们在室内分工协作汇集各册简要形态的基础上,撰写此文。^[1]由于目前尚处于整理初始阶段,本文旨在全面介绍该稿存在形态,分别叙述各册收录人物传记情形,在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清钞本以及《明史》修撰中产生的其他版本略做比对后,撮述所见阁藏《史稿》的修撰思想,并对阁藏《史稿》作者及其在清廷开馆修史过程中的地位,略抒己见。鉴于更多的识见,有待今后整理与研讨的进一步展开,本文的粗浅不成熟之处,尚祈方家指正。

一、天一阁藏《明史稿》存在形态

阁藏《史稿》十二册,其中六册(一至五、九册)为稿本,余为抄本。下



万斯同与《明史》

面先简要介绍该稿的存在形态。需要说明的是,这里的页数及形态均按照天一阁提供的拍照复印件整理。

第一册,稿本,78页,每页十二行,行二十至二十五字不等;朱、墨笔点读及删改,且以墨笔更动为主,有朱笔更动的共11页。本册含正传27,附传6^[2]:孙一元、张诗、张尺、吴纶、史鏊、唐豫、方太古、刘英、赵元韶、施凤、沈周、郭瑛、郑和、侯显、何孟春、吴一鹏、黄宗明、席书(席春、席篆)、毛澄、王軼、石珪、梁储(梁億)、费宏、王德明、张俊、安国、汪文盛(汪宗元、汪宗凯、汪宗伊)。首页钤“季野”长方印一枚,第77页有“万黄斋印”方印一枚。“郭瑛”传后、“郑和”传前的第16页及第78页空白。

第二册,稿本,30页,每页二十行,行二十五至三十字不等;朱、墨笔点读及删改,数量较均匀。册分“邹来学传”、“王士性传”两卷。传文在第14页前顺序排列,之后明显有错简。前者“邹来学传”卷目录正传16,附传1:邹来学、马昂、萧晷(石瑁)、张鹏、罗绮、翁世资、邢简、彭谊、贾铨、夏时正、刘孜、孙曰良、傀敬、尚褱、单宇,其中“翁世资、夏时正、刘孜、孙曰良、傀敬、尚褱、单宇”7人有目无文。目录标题下,钤章6枚。卷中另增目录中不存的“张文质”与萧晷、石瑁合传;“罗绮”传后、“张鹏”传前,有目录中不录的“李敏传”,并附按语:“附邹来学后。”“罗绮传”后也有同类性质的按语:“附罗亨信后。”(第10页)如是,计该卷正传11,附传3。后者“王士性传”卷正传9、附传5:王士性、王继光、周孔教、胡直、罗汝芳(梁汝元)、史桂芳、耿定向(耿定理、耿定力)、戴士衡(樊玉衡、樊维城)、王德完;缺目录中之“李贽”。目录页标题后,钤印19枚。

第三册,稿本,23页,每页二十三行,行二十五字。有朱、墨笔改动和点读,数量均等。末页钤“万黄斋印”。册分“罗钦顺传”、“方瑛传”两卷;首2页明显错简,应属第二册。前卷含正传4,附传2:罗钦顺(罗钦忠、罗钦德)、吕柟、于仕廉、顾宪成;后者含正传7,附传2:方瑛、李震、赵

胜、曹义(曹恺)、施聚(施鑑)、卫颖、孙镗。

第四册,稿本,88页,每页十至十二行,行二十五至二十八字不等,有朱、墨笔点读及删改。含正传22,附传37,不详别传2,有目无文传2:高燿、夏尚朴、于大节(萧显、杨智、李鸾、蒋昺、赵良、刘昂)、王崇之、高瑶(黎淳)、钱春、许仕达、许复礼、赵佑(朱廷声、徐钰、陈琳、王良臣、潘鏊、熊卓)、李熙(贡安甫、姚学礼)、李光翰(徐蕃、徐暹、任惠)、汤礼敬、葛嵩、洪垣(方瓘、吕怀)、董兴、刘聚、曾省吾(王篆、朱珪)、唐伯元、章时鸾、沈宠、梅守德、王国、魏允贞(魏允中、刘应麒、张允济)、(沈懋学、沈寿民[按,为沈宠之附传])、谢廷[卅涖]、陈登云、李献可(舒弘绪、陈尚象、孟养浩、丁懋学、吴之佳、叶初春、杨其休、董嗣成、贾名儒)、王德完。

第五册,稿本,30页,每页十行,行二十六至三十字不等。有朱、墨笔改,且含朱笔删改的为7页,少于墨笔的。首页钤阳文章3枚,末页钤“万黄斋印”。含正传24、附传26:毛志(方佑、邵有良、沈源)、胡深(陈宏、何纯、方昇、董旻、陈鹤、胡智、涂石?)、李旦(卢瑀、秦昇、童祝)、李俊、崔陞(苏章、彭纲、周轸、敖毓之、王纯)、王坦、叶钊、杨琅、黄仲昭(宋端仪)、周瑛、张元祯、谢铎、张谦、黄佐、余珊、张文明(王相、董相、刘士元)、叶洪、项乔、杨子器、刘邦采(从兄文敏、旌子晓、刘阳)、何秦、黄弘刚[按,二人合传]、魏良政(弟良器)、欧阳德。本册在“胡深传”后有生字注为“附郑己后”,查阁藏《史稿》并无郑己传记,可见本稿并非全本。

第六册,稿本,76页,每页十一行,行二十至二十五字不等。册中含大幅朱笔删改,例如“徐学谟传”的首页,朱笔删原文71字,补添215字于页眉,朱笔上另有墨笔修改之迹。卷首钤章3枚,册中空白页有5页,明显多于前述诸册。正传14、附传8:魏时亮、孙应鳌、毕锵、周世选、刘斯洁、王廷瞻、郝杰、王之垣、赵贤、徐学谟、郭成、杜桐、达云(达奇勋)、麻贵(麻承勋、麻承恩、麻承诏、麻承训、麻承宣、麻承宗、麻锦)。卷首目



万
斯
同
与
《
明
史
》

录页有“明史卷”、“列传第”字样，可见是已可列入明史列传部分的史稿。

第七册，稿本，65页，每页十行，行二十一字。为“忠义传”，署“徐潮具稿，监生叶沆录”。朱、墨笔删改，并以墨笔为主，间有传记含朱笔删改，计12页。卷首钤章2枚，末页有“万黄斋印”。目录列名正传35，附传4：孙玺、王鈇、钱泮（合传）、汪一中、黄钊、王邦直、钱鎔、宋以方、孙镗、王廷辅、宋珏（合传，宋珏目录无）、张世忠、万木、郑山（合传）、袁璋（子袭）、戎良翰、时植、张达、陈闻诗（董伦）、张振德、赵愷、王相、李涑、周宪、叶七、宗礼、唐孟元（唐孟远）、林京（林绶）、魏镜、姚长子、金养、王恭、向孔洙、雷应通。册中缺少目录中的“马呈图”、“杨辅政”两传；多“宋珏传”，故实际传文与目录所云“忠义传三十四篇”相符。其中王鈇与钱泮，王廷辅与宋珏，万木与郑山各二人合传。“王鈇传”明显为两种字体书写。值得注意的是每篇传文后，均加入空白页1页，为其它卷册所无，这种情况的出现，当不是为了隔断诸传，而可能是为修改者预备足够的空间，以方便删改初稿。

第八册，抄本，93页，每页十行，行二十字，首页钤2章，次页有“季野”章，末页钤“万黄斋印”。朱、墨笔删改，且墨笔少于朱笔的。卷首目录页有“明史卷”、“列传第一百九十二”字样。正传5、附传4：朱燮元、李樗（史永安、刘锡元）、王三善、蔡复一（王斌）、沈徽烺（闵洪学）。册中传文有错简，且传文较它卷为长。其中朱笔也有被涂抹、删改的情形，是该册的特殊之处。

第九册，稿本，147页。此册传文前的题记和目录页颇多可供了解阁藏《史稿》全文的信息。首页“季野先生小像”，后题款为“后学葛暘拜题”。第3页有吴泽（作于1934年）、葛暘（作于1936年）及陈寥士题记，钤章5枚。吴泽除了说季野先生的改动“颇有义法，非深于史学者弗能



为”，另从字体的角度，肯定该稿是万斯同手迹：“泽复以先生当年与人手札再三细校，字字结撰又不爽，累黍审为真迹无疑。”第5页李晋华作于1936年的题记，提到此稿为八册，“墨迹甚旧”，“朱笔竄改之处甚多”，且“闻为万季野哲嗣所缮，经季野删润者。是季野史稿又见一本矣”，并未对之作校勘和评判。他对藏于国家图书馆的313卷本《明史纪传》、416卷本《明史》的判断，下文在述及明史稿各本的特点时，再提出分析。第6页是1961年张宗祥题记，他根据此稿“字体含章草意味”，且“万氏早期字学石斋”，判断此稿当为万氏亲笔。

本册有3页目录，第63页列正传5、附传1：周朝瑞（徐大化）、袁化中、顾大章、周起元、王永光。在“顾大章”名下有小字注：“已上三传是第一百九十六”，“周起元”名旁见小字注：“一百九十七”，下有小字注：“稿见邹元标起首一本内”。“王永光”名旁见小字注：“一百九十三”，下有小字注：“稿见曹于汴起首一本内”。在列名之后，也有值得注意的文字：“此乃从稿本中膳清者。吾父又仔细看过，抄时当以稿本编次为据，此不过汇订成裘耳，无次序也。”这便提示我们，另有我们目前未见的，各以“邹元标”、“曹于汴”起首的两册史稿。可见阁藏《史稿》非完帙，且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各传排列，并非已经成熟的排列，据此可知此稿尚在变动之中。目录的作用，仅是列名，并非各传在《史稿》中的确切顺序。同样性质的文字，还见于第137-139页。该页有“附杨瑄传后”字样，同样，阁藏《史稿》并无杨瑄传。

第65页列正传8：赵彦、叶春及、李樵、沈傲炆、何乔远、周嘉谟、董应举。同页铃章19枚。

第105页朱笔列正传4：刘中敷、张凤、孙原贞、朱永。

本册朱、墨笔删改尤多，几乎隔行均有，两色均等。空白页有64页之多，其中有的空白页上印有“吴正裕号”印章。第147页有“万黄斋



印”。计有正传 20、附传 17：汪应蛟、赵彦、刘一焜、叶春及、李樵（史永安、刘锡玄）、沈傲炆（闵洪学）、何乔远、周嘉谟、刘中敷（刘桂、刘机、刘尚褊）、张凤（沈固）、孙原贞（薛希琏）、朱永、陈鉴（何观）、孟玘（章秦、杨集）、丁瑄（柳华、柴文显、汪澄）、宋钦（竺渊、耿定、王晟）、廖庄、陈嘉猷、李仪、丘弘。

第十册，抄本，108 页，每页十行，行二十一字，含朱笔少量删改 11 页，无墨笔删改。为“忠义传三”。首页钤章 21 枚。含正传 35：朱万年、张璠、张光奎、李中正、马足轻、方国儒、何承光、陆梦龙、庞瑜、闫生斗、尹梦鳌、韩光祖、卢谦、龚元祥、王信、梁志仁、王国训、洪云蒸、上官荃、张绍登、王焘、马如蛟、蒋佳征、徐尚卿、孙士美、白慧元、乔若雯、高重光、张秉文。另有零散传记 6：周朝瑞、徐大化（二人合传）、袁化中、顾大章、周起元、王永光、曾应遴。

第十一册，抄本，74 页，每页十行，行二十字。含朱笔删改，无墨笔删改。“申时行传”及附传，仅有点读，无任何删改。首末页均钤章。含正传 16、附传 20：宋钦、况钟、罗以礼、廖谟（扈暹、陈蚪、陈穀、宴穀、徐文振、刘说、杨禧、姚文）杨瓚、刘实（孙丙）、丘陵、张崑、姚堂、饶秉鉴、余瓚、周旭鉴（子鼎）、卫瑛、龙晋、黎永明、严永浚、黄瑜、吴孟埭（翟观）、申时行（子用懋、用嘉、孙绍芳）。

第十二册，抄本，104 页，每页十行，行二十二字。标题“明史卷”、“列传第一百十七”，钤 3 章。多为朱笔删改，墨笔更动仅 1 处。誊抄用纸及字体显示，该册实为两卷。首为“王宪”卷，计正传 7：王宪、金献民、李钺、王时中、王以旗、王邦瑞、聂豹。次为“杜常”卷，计正传 13、附传 22：杜常、宿进、戴??（按，二人合传。原注：“附李中传后”）、徐晞（王鍾、刘本道、张苗[按，原注：“附李友直传后”]）、范辂、陆垹（王德明）、曹琥（按，原注：“附周广后”）、姜至德、赵佑（朱廷声、徐钰、陈琳、王良臣、潘镗、[按，



原有“焦卓”，后删去])、秦文从(弟礼、武、礼子鸣春、鸣夏、鸣雷)、陈琳(按，赵佑传下已附陈琳传，此又单列，内容较前传为详，当为改附传为正传)、(□琰、□昂、刘漳)[按，是为错简，当为附传]、夏良胜(万潮、陈九川、徐鏊、张衍瑞[按，传首列名张朝瑞，当为张衍瑞]、张英)、熊浹。

在本册卷末第87-88页，有朱鼎煦于1963年所作题记：“右万季野先生明史列传稿十二册，凡文二百四十有八篇，中有二三人合传者，得二百五十有二人，益以附传一百三十有四人，都三百八十有六。”第92页，朱氏还对此稿做出判断，并说明了成稿顺序等，云：“(万斯同)竭二十三年之力，草此别传。初稿墨笔多出己手，亦有出写官或纂修官手者。朱笔则多出先生手，而如陈琳传乃不类。又魏时亮传以墨笔涂改朱笔一二字，虚字推敲，无关宏旨。”

综上所述，阁藏《史稿》十二册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：一是稿本，如第一至第五册、第九册；二是誊录稿本，如第七册，明确为徐潮具稿，叶沆录；三是抄本，抄写人不一，墨色有浓淡之别。然而，十二册具有的共同之处，就在于均见有朱、墨笔的改动。

各册改动多寡不同，删改情况又可分为四种：一是多数情况为墨笔改动的，如第一、五、七、八册；二是朱笔改动明显多于墨笔的仅见第六、十二册；三是朱墨笔改动大致相当的有第二、三、四、九册；四是完全无墨笔删改的有第十、十一册。

阁藏《史稿》的传稿，除了标示“徐潮具稿”的第七册明确非万氏亲笔，其余卷册中至少含有3种以上誊抄及朱墨删改的笔迹。一般而言，墨笔和朱笔的添注是同一笔体，已无异议，墨笔添注笔迹相同，确是能体现万氏修史思想的亲笔；与此笔迹相同的朱笔和第一至五、九册撰稿，当为一人笔迹，可认为是万氏亲笔。然第九册中，书写“周朝瑞”等6人名的目录页，明显非万氏笔迹。第六、八、十册原稿字体相同，不同于



万斯同与《明史》

前五册,当是书手誊抄,万斯同改定;杂入第十册的麻锦、麻贵等附传,则为万氏亲笔。第七册明确署名“徐潮具稿”,且是“叶沆录”,便不牵涉万斯同事,覈其笔迹,与第六、八、十册书手的不同,也有万斯同亲笔夹页于其中。第十一、十二册书手字体异于前述诸册,是多名书手参与其事的结果。

统计阁藏《史稿》人物传记共 406 篇,其中正传 248,附传 158;多于上述朱鼎煦统计的数字。

具体来看,天一阁藏《明史稿》中部分撰稿(第一至五、九册)出自万斯同之手,其余册则由书手誊抄,最后经万氏两番修订,形成如今我们所见的面貌。

二、天一阁藏《明史稿》的来历与已有研究

长期以来,阁藏《史稿》十二册,以其珍藏罕见和被推测为万斯同手稿,引得多位前贤从其铃章、字体、墨色及部分传文等方面,进行了考证和识断。1931 年,河南周氏携其称为万斯同所著《明史稿》至南京,由沙孟海居间,售与宁波朱鼎煦。^[3]这是对后来收入天一阁的十二册《史稿》首次出现情形的记录。同年,柳诒徵撰《明史稿校录》,认为此稿“信为康熙中明史馆纂修诸公手笔,不敢遽断为万先生书”。其判断是基于该稿签题和小印均可伪作,稿中被视为季野长子的题文,也因未署名而不可坐实;其中一册徐潮的具名(第七册),更令柳诒徵坚信:“从使朱批出万手,其墨笔原稿,必係史馆他人之作,非万氏所为也。”^[4]也在当年,冯梦颢引述陈训慈见告之语,认为“中州某所献《明史稿》,……绝非万氏原本也。”^[5]

其后,吴泽于 1934 年题记中,从字体的角度,肯定该稿是万斯同手





迹：“泽复以先生当年与人手札再三细校，字字结撰又不爽，累黍审为真迹无疑。”李晋华于1936年所作题记，提到所见史稿八册，“墨迹甚旧”，“朱笔窜改之处甚多”，“闻为万季野哲嗣所缮，经季野删润者。是季野史稿又见一本矣”，并未对之作校勘和评判。至1961年张宗祥的题记，根据阁藏《史稿》“字体含章草意味”，且“万氏早期字学石斋”，判断此稿当为万氏亲笔。^[9]

1964年谢国桢在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中论及此稿，认为其“每卷有‘季野’朱文印，文中间有涂改，当为季野手稿，但既未整理，亦残缺不完耳”。^[10]20年后，谢国桢修正了前说，认为：“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清王仁堪所藏《明史稿》三百十三卷本，确系清乾隆时传万氏旧本。”对阁藏《史稿》，则说因与《明史》卷目颇有不同，“或係季野为王鸿绪编《横云山人明史稿》的底本。……实则此书係内阁大库或明史馆递次修《明史》的底本，若说是真万季野之稿本，则未敢断定”。^[11]1986年陈训慈再申其师柳诒徵对该稿的判断，并追述柳氏誊抄其稿的过程是“为之总校，并录存已涂去字句，更用别色以誊改文”。^[12]1989年6月沙孟海据天一阁提供的照片判断：“天一阁照来的《明史稿》一张最为万氏代表作，不会假的。……《明史稿》我全看过，其中有万氏亲稿，有别人誊录经万氏朱墨笔修改，有完全是别人的稿子（有一册记得署名徐潮），……他（按，指柳诒徵）对我曾详论，并未全部否认。”^[13]当年12月，沙孟海专作《万季野明史稿题记》，详述阁藏《史稿》情形：“万季野《明史列传》手稿六册，膳本经万氏笔削者三册，……别有膳本一册，首页署徐潮居稿，共计十二册。全稿旧为中州周氏所藏，1932年余在南京见之，……先是，镇江柳翼谋先生诒徵尝观之，……未遽断为万氏书，……余证以《昭代明人尺牍》万氏复董巽子道权一札，……两处字迹，楷体上大下小，有时偶带草法，……上大下小，则惟万氏有此法。……已可初步确定前九册出于万氏手笔。……原稿旧有翁覃溪诗，丁小正跋，

万斯同与《明史》

皆伪迹，……别宥斋（按，指朱鼎煦之书斋）重装时悉删去。”^[11]

上述诸史学、书学名家对阁藏《史稿》是否为万斯同手稿，虽未能持一致或一贯的定见，但对墨笔原稿并非全是万斯同手稿，乃有他人誊抄之作杂入，存有共识；视朱笔修改之处为万斯同笔迹，异议不多，只是尚不及对笔体和笔迹进行细致考订和具体指说。方祖猷所说的“（对此稿）诸家评论不一，真伪难定，尚待考证”^[12]，便是目前对此稿最妥帖的论断。

前辈学者的识断，由此稿当时被开放的程度与同类善本的流通过程度所限。建国前，此稿即为海内珍藏，能亲见者寥寥，能汇集海内外公私庋藏的其它《明史》稿本或抄本，作卷次内容及版本形态上的对比研究和细致说明，则更为不易；所作讨论和识断，便多关注阁藏《史稿》是否为万斯同手稿，且所作的判断，只能多从撰写和誊抄的笔迹上说。持此稿前九册为万氏手笔观点的沙孟海，即是凭万斯同字体的特点判断，并未涉及史稿本身的内容。

三、天一阁藏《明史稿》形态略析

以上主要对于阁藏《史稿》的基本形态作了说明。下文对于阁藏《史稿》存在形态略加分析，初步考察这部《史稿》与现存万氏史稿抄本和其他《明史》纂修过程中形成的稿本、定本的关系，兼及万斯同的修史思想。试图从史学工作者的角度，着眼于阁藏《史稿》所具的稀见史料价值，在该稿被影印出版，供学界使用之际，初步说明其当为研究者注意之处。

1. 阁藏《史稿》中的墨笔、朱笔略析

阁藏《史稿》以墨笔初撰及誊抄，复以墨笔删改，再以朱笔增删、订正。删改的墨笔用意，在完善初撰或誊抄后的传文；且其字体与第一、



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九册誊抄之墨笔和全稿之朱笔相同，即上文提到的被一般认定为是万斯同的手笔。修订的朱笔，除了订正传文，还以传文的初撰者和订正后的再次誊抄者，为预设的读者，而有文字上的针对性与目的性。下面分类例说除完善文字外的两种。

不满初撰者陈传的一种，集中在字体不同于前5册的第六册中。该册“周世选”传是朱笔批改者颇不满意的一份传记。^[13]在第16页，朱笔删去了如下的77字：

时倭寇东南，御史行部至海上，世选从，倭报踵至，御史将去之。世选曰：‘督抚在远而公幸至，今去，民必恐而逃，有如倭遂登岸，蔓难图也。’御史然之，以兵属世选督而前，俘斩数十百人，获器甲资粮无算。

朱笔于页眉添注：“四十一年后，江南倭警已息，此恐未尝。”同页至次页，传文说：“……条上时政七事，又论劾礼部侍郎潘晟，工部尚书雷礼，吏部侍郎秦鸣雷，皆极切直。”朱笔添注：“论雷礼见《实录》，余未见。”第17页传文中有周世选“上疏陈时弊四事”的内容，朱笔添注云：“此疏平常，不必入传。”这和第20页传文说的“条上战守八议”，被朱笔添注“此八议亦平常，不当不传”，同属一类。

另有认为传文表述有误的。如第18页说：“世宗末，言官摧抑过甚，人皆以言为讳。穆宗即位，诸臣犹观望如昔。”朱笔注云：“隆庆初，言路大开，不得言‘观望如昔’。”从这几处朱笔添注所示对传文的异议来看，是认为原稿在史料的可靠性、措辞的严谨度和入传事件的重要性上，存在不确切、不准确和不必要的问题。

对所用史料和人物经历鉴别不清，以致割裂史实，也是朱笔重责的一种。例如第六册的“王廷瞻”传，朱笔删去第28页的7-10行，并反问撰者说：“此与下记‘光湖’只一事，何故分为二？”^[14]



万
斯
同
与
《
明
史
》



对誊抄者所说的,见于第四册中的“赵佑传”。在该册第 17 页传文中,有朱笔添注:“此处竟接下‘廷声,字克阶’段”,意在连缀第 19 页分段符后的文字;在第 20 页,“赵佑传”末,又有朱笔添注:“此下接上‘时与佑同以御史’一大段。”以接续被朱笔隔断未录的原撰传文。同类的情况,还见于同册“洪垣传”后,朱笔添注“同门生”,期以之连缀此页的“吕怀”传。从这些明显是为书手誊抄,以连缀成文而作的添注可见,朱笔删改者在史稿成文过程中,拥有明确的学术质量把关作用和绝对的编纂权威地位。

值得注意的是,阁藏《史稿》中墨笔、朱笔增删与调整文字之处,每册均有,但其传文却不因此而完备或完整。其中传文未完、有目无传、有传无目和册页顺序颠倒的情形,反而更拉近了我们与此稿真实形态的距离;从各册传文的成撰情况,推断该稿的成熟程度,也成为可能。

2. 阁藏《史稿》传文略析

阁藏《史稿》多有传文未完成和与目录不符的情况,如第一册 74 页“汪文盛传”附“子宗伊鲍象贤”,实际文中附有汪宗伊等 3 人,而鲍象贤在“鲍”字后无文,显示出传文未完成的状态。另有篇幅长短不协调和传文分散的现象。如第一册第 45—49 页的“毛澄传”,第 68 页的“张俊”传,第三册的“高瑶”传,均缺少依照行文必有的结尾段落或措辞。第四册目录中的“钱春”,第七册目录中的“马呈图”,均无传文呼应。首次出现于第二册的“王德完传”,其结尾部分,却在第四册。

第二、三册的特殊情况更值得注意。这两册传文均为次页在先,依倒序叠放。据上文判断,此稿可能是甫经书手誊抄,以待墨笔或朱笔批改的史馆工作本,致成册页颠倒的情况,或是书手在之前的初撰稿誊抄过后,未及再顺序排列,以复其原序,便呈请删改了。这或有为加快工作节奏的因素,也有书手疏忽或疏懒的可能。当然,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性,

那就是史稿是在后来散乱的。

无论如何,阁藏《史稿》十二册编纂、修改的状况,提示我们一个问题:它们并不是处在史馆成稿的同等程度或阶段上。明显的表征是,并非所有列于卷首的目录都标出该卷正、附传文所属的《明史·列传》的卷数;即使是标示了的,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别。如第六册,卷首仅有“明史第”、“列传第”字样,第八册则标示了“明史第”、“列传第一百九十二”这样更接近于成稿形态的信息。第九册目录中的小字注文,至少说史稿的这部分“列传”,已经放置到了第“一百九十七”。另有第十册所示此册为“忠义传三”,也比第七册仅示此册为“忠义传”进了一步,也是《史稿》各册并不处于修纂与删改同等阶段的证明。

同样能够提示我们此稿含有处于不同编纂阶段信息的,还有上文引述的第九册第 63 页的那句墨笔书写、明显不属传文的话:“此乃从稿本中誊清者。……抄时当以稿本编次为据,此不过汇订成裘耳,无次序也。”^[15]该册包括 3 页目录,分别是列出周朝瑞等 5 篇正传、1 篇附传的第 63 页,列出赵彦等 8 篇正传的第 65 页和朱笔列出刘中敷等 4 篇正传的第 105 页。这里所说从稿本中誊清而不依既定之序,再抄时以稿本为准的,是指周朝瑞等 6 人传文。或出于誊抄之便,或是书手随手摆放,以致有这一句徒作说明的传外文字。事实上,周朝瑞等传在见存阁藏《史稿》中的位置,并未被确定。第十册“忠义传三”后所附,便有包括周朝瑞等 5 人在内、并另有“曹应麟传”的 6 篇零散传记。

各册目录与其后正、附传的吻合程度及其所用墨、朱笔所示的撰写先后情况,也能说明这一问题。同在第九册,第 105 页有列名 4 人的另份目录,由朱笔书写,且只录正传,不录附传。事实上,其中刘中敷、张凤和孙原贞传后均附有 1-3 人不等的附传。这便能与上文引述的“抄时当以稿本编次为据,此不过汇订成裘耳,无次序也”适相印证。同类情况,另有

